

学林

← (上接13版)

本《皇帝的新衣》(开明书店, 1931年)撰写《付印题记》时也说:“《皇帝的新衣》是收在一八三七年出版的‘童话’第三部里,原是一个西班牙的故事。见曼努尔(Don Manuel)著《卢堪诺尔伯爵》第七章,安徒生取其事,改作此篇,而删去了教训的份子。”大概参考过周、张等人的介绍,其实也源于安徒生的自述。

赵景深翻译过丹麦评论家勃兰特的《安徒生童话的艺术》(载1925年《小说月报》第十六卷第九期),从研究者的角度做了重要补充。文中强调:“我们要想透澈的了解安徒生的艺术,请看他怎样工作。我们看他工作的程序,便可更深的明瞭他的艺术。最好是我们看他怎样改编童话,因为他的艺术方法在改编童话上是显示得很清楚的。我们不是把两篇东西拿来比较一下,瞎捧一顿便算完事;我们要很详细的叙述,仔细看看,那一处是他省略的,那一处是他扩大的,将他的作品顺序显示于我们眼底。”被拿来详细研讨的正是《皇帝的新衣》。勃兰特逐段译读了那个西班牙故事,虽然承认主体部分“开始很有趣,全篇故事也很幽默”,但也指出导入的时候“实在无味得很”,“只图发明自己隐藏着的哲理,却把读者的兴趣减去不少”,还特别批评最后所附的教训“非常可笑而且也无深意”。除了改动并增添部分情节外,安徒生将那些空泛的议论悉数删去,“以他的瘦手拙笔,使这故事离开原来的中心,以戏剧般的活泼,用对话体来叙述”,终于使改编后的作品焕然一新,成为“可赞美的故事”。尽管赵景深在此述而不作,并没有再做阐发,读者却足以了解故事的嬗变原委,并据此判别原作与改作的高下优劣。

在探究追溯这则童话的源流始末时,中国学者也有重要的发现。曾在重庆北碚国立编译馆工作的杨宪益晚年回忆道:“我在中国古籍图书室里花很多时间进行阅读和做笔记。1944至1946年间,我写下大量笔记,还写了大约两百篇短论文,论述的范围包括:中国古代史、中国文学史、古代神话传说、古代中外关系史以及中国少数民族的早期历史,等等。”(杨宪益著、薛鸿时译《漏船载酒忆当年》第二十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这些札记虽篇幅有限却言之有物,其中一篇《高僧传里的“国王新衣”故事》(载1947年《新中华》复刊第五卷第二期)开宗明义就



▲钱锺书《管锥编》

▲斯蒂·汤普森《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

说:“安徒生童话里面有一篇‘国王新衣’故事,在中国已甚普遍被人转译引用,而且一般人都认为这篇含有讽刺意味的作品,是欧洲童话里的杰作;殊不知这篇故事在一千多年前已见于中国纪载了。”随即指出南朝梁代慧皎所撰《高僧传》中有一篇鸠摩罗什的传记,记载这位东晋名僧曾师从罽宾法师盘头达多,盘头达多在为他解说佛法时讲述过一个故事:“如昔狂人,令绩师绩绵,极令细好。绩师加意,细若微尘,狂人尤恨其粗。绩师大怒,乃指空示曰:‘此是细缕。’狂人曰:‘何以不见?’师曰:‘此缕极细,我工之良匠,犹且不见,况他人耶?’狂人大喜,以付织师,师亦效焉。皆蒙上赏,而无实物。”不少细节都和《皇帝的新衣》类似。杨宪益据此推断:“这故事如果是盘头达多说的,那样它至晚在西元四世纪初年业已存在,恐怕原来是印度的故事,而由《高僧传》的纪载看来,至晚在西元六世纪初年业已传入中国了。”尽管他没有留意安徒生自己提到的西班牙渊源,却一下子把这个故事原型的出现提前了将近一千年。包括这篇短论在内的二十余篇札记曾结集为《零星新笈》(中华书局,1947年),后又增订成《译余偶拾》(三联书店,1983年),关于这则童话的渊源考辨也就逐渐为学界所知了。

早年在英国牛津留学时就已结识杨宪益,后来又和他多有文字往来的钱锺书,在此基础上又有新的收获。他在《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中发现宋人所编《太平广记》中有一篇根据《高僧传》删订而成的《鸠摩罗什》,其中“记大阿盘头达多语一节尤佳”。在节录相关内容后,他有按语评析道:“安徒生童话《皇帝新衣》(The

Emperor's New Clothes)一篇,举世传诵,机杼酷肖;唯未谓帝脱故着新,招摇过市,一无知小儿呼曰:‘何一丝不挂!’(‘But he has nothing on!’ a little child cried out at last),转笔冷隽,释书所不办也。”(见该书《太平广记》部分第三十八则)既指出《高僧传》故事与安徒生童话在构思方面极其相似,又强调后者所增小儿当众高呼的情节,使得故事发展奇峰陡起,意味深长隽永,远非前者所能企及。读者从中不难体会到安徒生匠心独具、点铁成金的高超手段。

钱锺书在讨论时还引录了明末陈际泰《王子凉诗集序》中的一段文字,也值得注意。陈氏在序言中说,“余读西氏记,言遮须国王之织,类于母猴之削之见欺也。欲其布织轻细,等于朝之薄烟,乃悬上赏以走异国之工”,“有黠者闭户经年,曰:‘布已成。’捧于手以进,视之,等于空虚也。王大悦,辄赏之。因自逃也”。钱锺书指出:“‘母猴之削’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西氏记’疑即指《鸠摩罗什传》,陈氏加以渲染耳。”虽然未做深入研讨,但已经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母猴之削”的故事是说有卫人自称能在荆棘刺上镂刻母猴,燕王信以为真,将其奉为上宾。可当燕王想要亲眼目睹时,卫人却千方百计予以阻挠。就具体情节而言,只是在谎言欺骗君王方面与《皇帝的新衣》相仿。相较之下,倒是“遮须国王之织”的故事和此后问世的安徒生童话更为相似。这究竟只是陈际泰依据《鸠摩罗什传》敷衍渲染而成,还是另有其他渊源可本,着实令人颇感好奇。

通过杨宪益和钱锺书的悉心爬梳,披露了保存在中国典籍中的类似记载。出现这种现象其实也不足为奇,美国民俗

学家斯蒂·汤普森在《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郑海等译,郑凡校,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中说过:“对普遍存在的或远古的民间故事,恰恰有更明确的证据表明,最不相似的民族也有他们故事内容上的极其相似点。同样的故事类型和叙事主题,以最令人迷惑的方式遍及世界。识别这些相似点并试图解释它们,使一个学者更加接近对人类文化本性的理解。”(见该书第一章《民间故事的普遍性》)从上世纪二十年代起,汤普森本人就在芬兰学者阿尔奈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增订编制《民间故事类型索引》(The Types of the Folktale: A Classification and Bibliography),对流传于世界各地的民间故事予以分类和编码,其中就列有“皇帝的新衣”这一类型。而用他们两位姓氏首字母命名的AT类型分类法,也逐渐成为各国学者研究民间故事时的重要参照。美国儿童文学家珍妮·约伦在编纂《世界著名民间故事大观》(潘国庆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时,就搜集了流传于美国的民间故事《两个老妇打赌》,在注释中参酌AT分类法介绍说,“类似的故事亦见于土耳其、以色列,以及一直到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广大地域”,“故事中该人赤身裸体却以为美服在身这一情节,在斯堪的纳维亚有种种变异,为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提供了原型”,提供了新的视角来考察这个故事类型的传播。

上世纪七十年代,美籍华裔学者丁乃通也借鉴了AT分类法,而将研究范围限定于中国。在他编制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郑建成等译,李广成校,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里同样列有“皇帝的新

衣”一类,并概括其主旨为“人们赞美看不见的织物”(见该书“I笑话”,编号1620)。尽管他依据的资料源于现代人编写的《讽刺笑话集》,未能依循杨宪益或钱锺书提供的线索沿波讨源,因而招致德国学者艾伯华的批评,认为“从故事题目看,我们看不出是中国故事,这部笑话集同时还收了外国笑话”;但艾伯华同样提到,“从这个故事类型本身说,确实是很像安徒生童话中的‘皇帝的新装’,而我已在拙著中指出,我坚信它产生于中国的东部”(董晓萍译《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以口头传统与无宗教的古典文学文献为主》,载《民族文学研究》2008年第三期;又收入艾伯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修订版,王燕生、周祖生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艾伯华所说的“拙著”即指该书)。经过众多中外学人的共同努力,使得流传于中国的同类型故事得以依照国际标准编码予以著录,可供越来越多的学者参考比较。尽管并不能由此轻率地判定最初的源头或梳理彼此的关联,但正像丁乃通所强调的那样,“不管这些中国故事与国际的标准形式有多少差异,对于想探讨民间故事如何影响民风民俗、如何传布和发展的学者,这些故事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导言》)。

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人而言,确实经历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而天翻地覆的剧变。然而延续了两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政体虽然在名义上已告终结,可是称帝、复辟之类的闹剧却常有回光返照乃至卷土重来的迹象,种种背离现代文明的陈腐观念和卑劣品性更是根深蒂固地残存于人们的潜意识之中。因此在《皇帝的新衣》中粉墨登场的各色人等:贪慕虚荣而颞顽愚蠢的国王、曲意逢迎而阿谀求容的大臣、奸诈诡谲而投机牟利的骗子、随声附和而人云亦云的庸众……总让人感觉似曾相识,有时甚至恍在眼前。鲁迅曾经借助这个童话借题发挥说:“不过须是孩子,才会照实的大声说出来。孩子不会看文学家的‘创作’,于是在中国就没有人来道破。”(《“……”“□□□□”论补》,收入《花边文学》)童话中的孩子能够肆无忌惮地戳破谎言,现实中的成人却未必可以放言无忌。这恐怕正是触动读者们在一笑之余顿生感喟的奥秘所在,也正是吸引这么多翻译家、创作人和研究者为此倾注心力的主要原因吧。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